

2301

昆明工运史 研究资料

第四辑

昆明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组

1985年6月

目 录

忆大成实业公司工人运动……………（1）

杨劲松	赵必成	何其凤
李克敏	周登歧	梁国选
杨自毅	那家福	郗顺昌
执 笔	王 靖	

回忆解放前在中央机器厂、云南中央无线电厂开展工运

活动的一些情况……………姚静（12）

昆明市耀龙电力公司“耀龙合唱团”的组建及活动

情况……………张 栋 杨学端 杨德富整理（18）

忆大成实业公司工人运动

杨劲松	赵必成	何其凤
李克敏	周登歧	梁国选
杨自毅	那家福	郇顺昌
执	笔	王 靖

大成实业公司是在抗战初期一九三八年由云南民族资本家董澄农、董仁民父子与上海内迁的企业家施嘉干合伙经营，有伪省财政厅入股并取得云南当局上层支持的半官半私的工商企业。该企业开业资本较大(二百二十五万银元)，经营范围广，包括面粉、味精、榨油、锯木、烧碱、电石、肥皂、化工等直接关系民生的产品。其中一些产品，曾一度垄断昆明市场，不几年便发展成了一个包括夏窑厂区、普坪化工厂区、开远电石厂区、交三桥厂区以及转运站、门市部等在内六百多人的联合企业，产值连续翻了数番。

该公司职工除随施嘉干从上海来昆的一批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及高级技术工人(这些人把持着全公司的大权，包括各级管理工作)外，大多数工人系云南各地破产而来城市谋生的农民和为躲避反动政府征兵而进厂的城市贫民。他们为该企业的发展拼死拼活，出力流汗，做工多年而收入却极其微薄，生活十分贫困。随着生产的发展，厂方又反过来不断地进行裁员，工人还随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夺取胜利果实

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疯狂地征粮、征税、征丁和滥发纸币，钞票天天贬值，物价飞涨，工人处境日益恶化，要求改善生活，改变政治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

〈一〉有压迫就有反抗

一九四七年秋，厂方不顾工人的死活，又随意开除解雇工人时，遂诱发起第一次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夏窑厂区电石车间工人朱伟与机修车间工人黎忠康首先在工人中喊出了工人弟兄们积压已久的共同心声“不准开除、解雇工人，必须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立即得到了厂区一些工人的响应，其中包括：机修车间工人赵必成、陶〇〇、蔡〇〇，仓库管理工梁国选，张自贵，面粉厂的几个搬运工还有电石车间的好几个工人。他们又分头去串联一些工人。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准备联合起来找厂方进行说理斗争，给其施加压力，迫使答应上述要求。

当时，朱伟分析，开远电石厂是独家经营电石的厂子，与个旧锡矿有着密切的业务来往，在大成实业公司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远离昆明，又是国民党和公司控制比较薄弱的地方，便于联络工人弟兄开展活动，必要时可以请他们支援昆明的斗争。朱伟考虑到自己与开远电石厂有业务关系，熟人多，于是便与黎忠康出面前往开远串联。

朱、黎二人到开远电石厂后，未料到厂方已有了防备，活动受到监视。朱、黎二人知道行动业已暴露，便迅速返回夏窑厂区，向大家说明情况，统一了思想并研究了对付厂方的措施，提出了：朱、黎二人是工人的代表，如遭厂方迫害，大家就要团结一致与厂方进行斗争。同时，推选陶〇〇为大家的代表，由他准备在公开的场合代表大家发言，与厂方进行说理斗

争。

朱、黎二人回厂不久的一天下午，公司总务主任(施嘉干的代理人)方刚便在夏窑厂区召开大会，宣布：朱、黎二人“在夏窑厂区及开远电石厂等地煽动工人闹事，图谋不轨”，公司决定予以开除。面对公司这一无理决定，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了陶〇〇的身上，希望他站起来代表大家讲话，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但他却一言未发。方刚随即宣布散会，弄得大家束手无策。随后大家一致遣责闹〇〇，骂他斗争不坚定，为什么当场不站出来讲话，并纷纷为被开除的朱、黎二人捐款帮助他们的生活，这场刚刚发动起来的工人争生存的斗争遂告夭折。

接着，一九四八年秋，夏窑厂区进步职员杨劲松又在职员中进行串联，发动驱逐厂区反动主任沈年阜(施嘉干的亲信)的活动。他们利用地方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联名上书地方势力——公司总经理董仁民，历数沈某目无总经理，克扣当地职工工资，随便解雇当地职员、工人……等问题，要求解除他的职务。对此，董仁民出于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未予理睬。

以上两次斗争，均因是职工的自发斗争，没有党的领导，人们思想涣散，群众发动和组织准备不足而未达目的。斗争的失利曾一度给工人群众精神上带来无形的重压，使大成公司自发的工人运动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是当时昆明地区社会上大、中学校学生民主运动的高涨，使斗争中的进步职工看到了光明，增强了斗争的信心，于是产生了到大专院校里去找党的渴望。

〈二〉工人运动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杨劲松通过师院同乡杨灿东(当时师院

地下党员)与地下党昆明市委领导下的邓学元取得了联系。从此大成公司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才打开了新的局面,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活动。

四八年底在邓学元同志的具体指示下,杨劲松串联了职员何其凤,工人赵必成、张自贵、周登歧等人开展读书活动,秘密传看《时代》、《新观察》、《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和文件,并于四九年初在小范围内试办了一个工人夜校识字班(上课次数不多)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

一九四九年一月邓学元介绍杨劲松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三月底发展为党员。同年四月又由杨劲松介绍发展赵必成入党,从此在大成公司建立了党的组织。随后,在邓学元的指示下开始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吸收一批进步职员和工人加入“工盟”(即民主工人同盟),并逐渐把工作范围扩大到夏窑以外的几个厂区及公司本部,先后发展了夏窑厂区的何其凤、张自贵、梁国选、周登歧,化工厂的何天宝、陈锡寿、李克敏,交三桥厂区的尹治林、赵鉴、那家富,公司本部的赵汉章、杨自毅等一批职工加入“工盟”,并以这些同志为中心开展群众活动,组织教唱进步歌曲(《山那边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传看进步书刊、文件(如《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传播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教育大家认清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光荣的任务,引导大家认清形势,提高觉悟。影响不断扩大。

〈三〉求生存,争民主,建立职工联谊会

一九四九年六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南下后,华东、华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的发展形势,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昆明地下党市委决定各系统归口领导。大成的工运活动遂

归口由地下党厂工委负责人唐嘉宾同志直接来抓，加强了地下党对大成工运的领导。由党员杨劲松、赵必成及盟员何其凤、张自贵、赵汉章等同志组成了大成公司“工盟”支部。每周碰头一次由唐嘉宾同志收集汇报，传达胜利消息、党的指示，布置任务。为确保安全，会议地点经常变换，有时在盟员的家里；有时在野外的山上寺院；有时甚至钻进国民党省党部大院，利用担任省党部妇女干事的杨立芳（杨劲松的姐姐，同情革命）的宿舍，由她放哨，掩护开会。由于上述原因，工作开展得还比较顺利。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经全面崩溃，金、银元券大幅度贬值，如同废纸，物价飞涨，职工生活朝不保夕。地下党分析了全公司的情况，认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呼声正在高涨，由于党、盟成员在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影响。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一次全公司的罢工斗争，把求生存的经济斗争与争民主、求解放的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次显示力量的公开的群众运动，以利在斗争中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使党、盟员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同时在社会上扩大影响。

在唐嘉宾同志的领导下，工盟支部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认为地下党的分析是正确的，一致同意举行一次全公司范围的求生存、争民主的统一斗争行动。同时研究了行动的目的、步骤、组织领导等有关具体问题。会后，立即按计划分头行动，布置到全体盟员中去，再由盟员分头串联基本工人、职员群众，推举出赵必成、周登歧、何天宝、白耀光、尹治林等同志为全公司的工人代表，于七月一日先在夏窑厂区集中而后到昆明总公司谈判。同时做好了一旦谈判破裂进行罢工的各项

组织准备。当天谈判代表向公司经理代理人递交了全体工人的请愿书，提出三项要求：

一、增加工资，每月工人最低不能少于一公石五斗大米（约合二百市斤），并以发放工资当天市场的米价，折为云南银币（半升）发给；

二、不准随便解雇、开除和打骂工人；

三、在全公司成立职工联谊会。

公司拒绝了上述条件，谈判宣告中断。工人代表立即按原计划到各厂区向工人进行传达，并连夜组织人力（其中有梁国选、周登歧、张自贵、赵必成、蔡继正等同志）写了大量的大字标语，分头张贴在昆明到西区的沿途各地以及进入城区的汽车上，遂于七月二日全面开始了怠工（即人在厂，不干活的罢工），全公司各厂区顿时陷于瘫痪。为了应付万一，工人们都在厂区待命。夏窑厂区还组织了一个廿多人的护厂队，由梁国选负责，防止坏人破坏，保护工厂，物资只准进不准出。当时，曾经于四七年秋在工人运动中斗争不坚定的陶○○又在那里对这次罢工散布失败情绪，鼓动其妻弟蔡○○等人到车间上工，企图干扰这次罢工行动。随即遭到护厂队的谴责，被大家轰出了厂区。与此同时工盟还派人分头到附近学校、工厂以及当时昆明的进步报馆《正义报》散发了事先准备好的以职工联谊会名义印发的呼吁书，吁请社会的声援，借以扩大声势。

七月三日《正义报》在第四版以《饭吃不饱哪来力气做工、大成工人请加待迁，发出怠工宣言，敦促老板怜悯》为题，发表了大成职工联谊会告社会人事书，说明大成老板剥削工人起家以及工人饥寒交迫的处境，无奈被迫于七月二日开始怠工，呼请社会支持，敦促厂方答应改善工人处境。

这一罢行动使公司慌了手脚，连忙请出了国民党伪省府社会处，伪市工会出面调停，两次邀请大成公司罢工工人派代表前去“谈判”。地下党和大成工盟组织深知伪社会处及伪市工会的所谓“调停”是玩弄花招，遂通报各厂，提醒大家要百倍警惕敌人的阴谋诡计，坚持罢工，对他们邀请“谈判”的做法不予理睬。

罢工斗争坚持了三天，公司无奈才被迫接受全部条件。当天，在工盟的领导下由工人代表出面便在夏窑厂区食堂召开了职工大会，宣布成立了职工联谊会。会上选出了联谊会的领导成员，由工盟盟员何宝璋任主任干事。随后各厂区又分别成立了职工联谊会分会，为进一步开展斗争建立了公开的群众组织，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党、盟成员和广大职工群众团结战斗的信心和意志，从而取得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全面胜利，达到了这次斗争的预定目的。

罢工胜利后，大成工盟支部对这次罢工斗争进行了全面总结，吸收了在罢工斗争中经受了考验，表现坚定的工人入盟，扩大了党的外围组织“工盟”的队伍，作为团结广大职工的“职工联谊会”的骨干力量。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大成职工联谊会于八月份邀请了进步的大、中学生（其中有云大的窦进安、叶萍、龙佩珠等）来公司各厂教唱革命歌曲，教跳秧歌舞。除在公司内广泛地开展各项群众活动外，还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为名组织了以夏窑厂区工盟成员周登歧、郗顺昌、李永富、孙文荣等同志为主广泛吸收进步职工参加（有张国栋、叶树怀、李林波……等）的约数十人的歌咏队和篮球队，到周围工厂（包括本公司各厂区和伪资源委员会的电工器材厂等单位）串联，互通情况，鼓励和支持兄弟厂

工人求生存、争民主的斗争。并与化工厂的职工一起到普坪村的天南中学与学生联合举行营火晚会，一起唱革命歌曲，跳“团结就是力量”的集体舞。随着云南大学的进步学生李炎（何其凤的同学）等又通过云大毕业的学生，当时已任化工厂厂长的李钟俊的关系，要求到化工厂“实习”，深入厂区与工人串联。一时间厂与厂，厂与校之间来往频繁，对当时西区厂、校工人、学生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促进很大。在安宁地区的中国电力制钢厂职工就是在大成公司罢工胜利之后第三天——七月七日宣布罢工的。七月八日《正义报》第四版以《中国电力制钢厂工人，肚子难饱停止工作，他们发出沉痛呼吁，说明苦衷》为题发表了中国电力制钢厂全体工人的罢工宣言——告社会人士书，历数了厂方残酷压榨工人，在工人本来就活不下去的情况下，又以生意不好为借口将工人工资减半，把工人逼入绝境，被迫罢工。并以大成公司工人怠工斗争所提的条件为榜样，向厂方提出要求：“一、请厂方照大成公司工人待遇发给同人，起码每人每月食米一公石五斗之待遇；二、不准无故辞退或开除工人；三、……”由此可见大成工人斗争的胜利对兄弟厂工人斗争影响之一斑。

〈四〉“九·九整肃”事件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一步控制云南，把云南作为它垂死挣扎的最后基地，对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频频施加压力，迫使卢汉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宣布进行所谓的“整肃”，下令解散一切群众组织，查封昆明进步报刊，禁止一切集会活动，出动军警大肆逮捕党内外革命人士，一时间昆明地区陷入了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由于地下党事先对卢汉向右转的可能性做过充分的估计，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厂工委决定把处于大成第

一线的杨劲松、赵必成两同志暂作转移隐蔽，停止职工联谊会的活动，让第二线的同志处理遗留下来的工作，转入隐蔽的斗争，由何其凤、张自贵、杨自毅、何天宝、周德成等同志组成新的工盟支部，加之大成公司是国民党控制比较薄弱的地方，因此党群组织没有遭到损失。

〈五〉保厂护产，迎接解放

“九·九整肃”事件过后，在地下党厂工委负责人唐嘉宾同志领导下，大成公司整顿了党、盟组织，切断了在九·九白色恐怖下动摇逃跑的工盟支部成员（总公司采运股长）赵〇〇和表现不好的肥皂厂盟员胡〇〇以及总公司有特嫌的盟员（总公司总务股长）张仿近等一部分人与工盟的关系（注：当时地下党昆明市委决定，凡在“九·九整肃”中动摇逃跑的党、盟成员，一律作为自动脱党、脱盟处理）。并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何其凤、张自贵、周登歧三同志入党 and 一部分同志入盟。

大成党盟组织经过整顿，纯洁了内部，壮大了队伍，满怀信心地又投入了新的斗争。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宣布了蒋家王朝的灭亡，人民解放军一面继续扫荡华南残敌，一面正向西南进军，云南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当时党、盟组织迅速动员群众转入了保厂护厂迎接解放的斗争，同时恢复了职工联谊会的活动。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各厂区按照党的指示都分别以盟员为骨干组成了保厂队。夏窑厂区由梁国选任护厂队长；城区（包括总公司和交三桥厂区）由杨自毅、尹治林负责；化工厂由何天宝、李克敏、周德成等负责。他们分别对大成各项机器设备、材料暗中进行造册登记，对公司资金加强监督，严防破坏

和转移。同时按照唐嘉宾的指示参加了与电工器材厂（联系人黄本初、李聪），昆湖电厂（联系人谭盛枢），等单位的西区工人联防，相互约定信号，一家有事各家支援。为了武装护厂，当时在护厂队中，有条件的何其凤，周登歧、张自贵、何天宝、周德成等还自备了枪支弹药。

当时我省边区党委领导下的边区纵队在广大农村的武装斗争十分活跃，为支持农村的武装斗争，唐嘉宾还布置大成准备炸药。大成工盟组织指定盟员何宝璋（技术员）与钱伟负责试制引爆药，由何其凤进行配合。试制成功后，并由何其凤将炸药一袋伪装成食盐，交由杨自毅转送上级党组织，支援兄弟单位的斗争。与此同时组织还指定何其凤、钱伟等同志对附近铁路、公路的桥梁、涵洞暗中进行了测量计算，作好必要时使用炸药炸桥的准备，以迟滞国民党军队的西撤。

此外，大成工人中，有些是富民人，他们还利用乡谊关系，对马街一带的地方武装中的同乡了解情况，准备进行策反工作，或者在时机成熟时夺取他们的武器来装备自己，以备武装斗争，迎接昆明解放。

〈六〉武装保卫昆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卢汉宣布和平起义后，社会比较动荡，大成各厂区护厂队加强了厂内外的巡逻，维护厂区附近的治安，准备迎接接管。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嫡系部队第八军和二十六军已开始从东、南两个方向向昆明反扑，形势十分吃紧。唐嘉宾同志来厂传达了市委关于组织工人义勇自卫队，武装护厂，武装保卫昆明的指示。十七日各厂分别以工盟为主主持召开职工大会，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大家报名参加义勇自卫队。当时仅夏窑厂区报名的就达八十余人。当天，各厂

便集体到达了指定地点——昆明景星小学，参加了以工人为主体组成的义勇自卫总队。大成公司各厂与电工器材厂、昆明电厂编为一大队的二中队，由杨自毅同志担任中队长。队员领了枪支弹药，具体负责正义路、三市街、南屏街、长春路等市中心的武装巡逻以及配合有关部门抓捕特务的任务。

义勇自卫队与起义部队（负责城外第一防线）和起义警察（负责城墙、城门第二防线）以及全市人民一起，经过了一周的战斗，由于我人民解放军提前入滇的进军声势，反扑昆明的国民党队伍仓惶逃跑，武装保卫昆明的任务遂告胜利完成。各厂工人义勇自卫队撤回原单位，转为保卫工厂，恢复生产，准备迎接我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

〈七〉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赵必成同志调昆明市总工会筹委会任付主任委员。杨劲松同志调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任主任委员，在昆明市委的领导下筹备建立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维护社会治安等，进行了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大成公司广大职工与全市各界人民群众一起，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大军入城。当天，在拓东体育场举行的隆重的迎军仪式上，由赵必成同志代表全市人民致欢迎词，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接管，表示了全市工人阶级定将团结全市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新昆明的决心。云南昆明的工人运动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大成实业公司的工人运动，从开始的自发活动到接受党的领导，经过多年的斗争，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从此走上了胜利的坦途。在大成的工运中曾涌现出不少的积极分子，许多人被接收为党、盟成员。到解放军入城接管时，已有党员二十多人，盟员近百人。接管后其中大部分同志先后被调出支援各级党政机关，成为工作中的骨干。

回忆解放前的 中央机器厂、云南中央无线电 厂开展工运活动的一些情况

姚 静

我是一九三七年十一分离开南京，到湖南湘潭国民党军政部第三被服厂当工人（该厂又称军政部军需署实验工厂）。当时在厂里就正式成立了党支部 成员有熊 寄萍、曾 群、周继房。一九三九年三月我到了桂林。一九四一年三月 敌人要抓我，因此我离开了桂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参加了国民党第五军装甲兵到了缅甸。一九四二年五月回到昆明。我是一九四一年三月离开广西被服厂以后入党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在昆明找到了原第三被服厂的领导人熊寄萍，他当时在市立医院任会计科组长。先经过熊寄萍的爱人梁薇娟的介绍，找了熟人陈兴木，经过他活动找到中央机器厂第六分厂的车间主任倪长根，经倪同意我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进中央机器厂当学徒，学车工。该厂是造纺织机械的。我进厂后在学徒中，经过选拔培养了三个积极分子，名字叫张德明、邹瑞、王尚良。张德明又叫张惠明，解放前夕在新平牺牲了。

培养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先找培养对象进行个别谈话，向他们宣传一些进步思想。当时还不提党的事，方式是灵活多样

的，如早上起来锻炼身体，一起跑步到山坡上。我们就在松林中进行个别交谈。主要向他们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说世上根本没有鬼神，要相信科学，晚上还带他们出去，在山头上走夜路。有时还用讲故事的方式，宣传苏联革命的经验。宣传资本主义的剥削是造成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所以就出现了挖煤的人无煤烧，种粮的人无粮吃的社会现象。张德明同志听了这些宣传后，看不惯车间工头欺压工人的所作所为，就跟工干头起来了。

当时，我们也不轻易搞罢工斗争，主要是秘密地开展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在进行个别教育的基础上，我们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读书小组。参加的人是三个培养对象和我，学习的书是《通俗经济学》和《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当时城里书店里公开出售，以此为启蒙教材，组织他们学一段，讲一段，还进行讨论。经过学习，帮助他们提高了思想认识，看清了形势。这几个同志在以后的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二月份春节前，在中央机器厂六分厂搞过一次罢工斗争，时间是一天。起因是节前厂方给职员和技工借钱过节，就是不给六十多个学徒借钱，并通知节前的那个星期日不休息，照常上班，集中到春节放假这件事在学徒中引起了一些不满，纷纷议论厂方的这个规定不合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及时向熊寄萍同志作了反映，并说打算借此机会搞一次学徒工的罢工斗争。熊寄萍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可以抓住这个机会，组织一次罢工斗争，你不必出面，但要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回厂后我把这个意思给王尚良同志讲了，并与他作了一些研究。罢工前我们把六分厂的学徒集中起来，在王尚良隔壁的宿舍里开了一个会，讲明要过春节厂方不借钱给我们。没有

钱过不了节，星期天要我们上班我们就不上，用这个行动来进行反对。到会的学工一致同意这个意见。为了组织好这次斗争，会上还宣布成立了“学徒工联谊会”负责进行组织工作。到了星期日分厂六十多个学徒工，一个也没有进车间上班，都到黑龙潭去玩了。厂方知道这个情况后，很受震动，因为这是厂里的第一次罢工，当天上午就同意给学徒工借钱，并派人到黑龙潭去通知大家，希望大家下午回厂上班。学工们知道消息后，有的说：“我们既然出来了，要罢工干脆就罢一天，痛痛快快地玩玩”。因此下午就没有人回厂上班。经六分厂学徒这么一闹，厂方给所有各分厂的学徒工都借了过节钱。但到了第二天，厂方就采取了措施，六分厂厂长连忠经（外号连瞎子）把我和两个学徒叫去，先问那两个学徒：“你们为什么要罢工”？他俩一致回答：“我们没有罢工既然不给我们借钱，星期日照常休息”。连瞎子大怒，叫人把他俩关起来，退还伙食费后再开除厂。然后他又问我：“你为什么耍罢工”？我那时早有准备，经“学徒工联谊会”同意我不参加罢工，事先向厂方请了假，因此我不慌不忙地说：“我没有罢工，我又不缺钱用，昨天我是请假进城买菜备酒准备谢师傅的”。连一查，果然我是请了假的，没有理由办我，于是冷冷地说：“好，算你狡猾”！接着便把我从老厂调到新厂去工作。

当时，为了不让那两个被无辜开除的学徒工生活上产生困难，我们发动大家凑钱，替他俩交清了伙食费，事后还帮助他们找了工作。

搞了这次斗争后，经组织决定，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我请长假离开了中央机器厂六分厂到了太华织布厂。进厂后，我又进城跟熊寄萍进行联系，他说：“新到一个厂，情况还不了

解，暂时不要动，隐蔽一下看看情况再说”。不久熊寄萍要我前去报考中央无线电厂，考取后，但太华厂不让我走，原因是厂里正在改装纺织机，车工的活计比较多，只好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同年七月，我又通过该厂的会计股长张正礼（现在南京七一四厂任总会计师，当时他的思想比较进步）介绍去考无线电厂，又被录取。这样我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便进了中央无线电厂工作，分在手摇发电机组当车工。当时厂里党员只有我一人，又在厂里培养了两个青年工人，名字叫韦宽、高伟青，并通过他们团结了一些人。进厂八个月先后搞了三次罢工斗争，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后不久，第二次是四五年年底，第三次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工厂搬迁到上海后三个月，为复工的问题进行斗争。这几次斗争都是围绕着发遣散费和还乡路费的问题进行斗争。厂方提出发遣散费的标准是：工龄满三年发三个月，两年发两个月，一年发一个月。经过群众酝酿，推选了十个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我们提出的条件是：工龄满一年以上的发三个月工资，一年发两个月。第一次谈判没有谈成，后来又增加了五个代表，其中有李鸿逵和我，最后谈判成功了，大多数职工遣散，留下一部分职工干未完成的活。第二次谈判，厂长金贤藻（民主人士）在重庆，我们是用无线电话机逼着付厂长光德坤同他进行谈判的，经过二十多天的怠工（人在厂不干活）斗争，厂方才被迫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条件遣散回乡的职工发了三个月的遣散费并按路程的远近发给路费，每人每天还给四角的伙食费，连家属也领了伙食费。对留下来的职工也加发了两个月的工资。随厂回上海的照发，厂方负责交通工具及伙食费。一九四六年三月工厂搬迁到上海后，厂方就宣布一部分到上海的职工发半个月的工资，有职留薪，